

丝绸之路

古代种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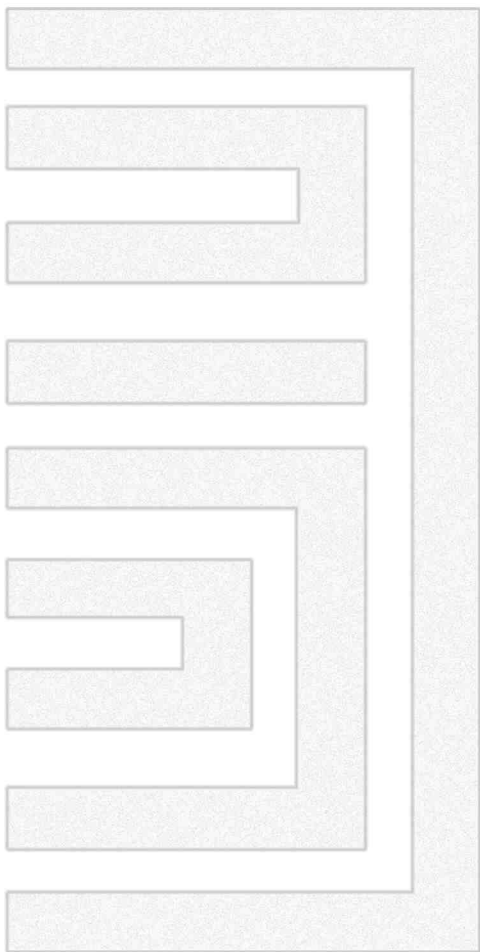
韩康信 著





作者简介

韩康信 1935年生,江苏镇江人。1962年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毕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及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2000年受聘为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人类群体遗传学客座教授。2007年受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古代人类遗骨的人类学鉴定及种族形态和生物测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主要作者之一和编者)、《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山东临淄周一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之比较——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日本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发行,2000)、《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中国远古开颅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发表论文和报告近200篇。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古代种族研究

韩康信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10-0955528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 屹

副 主 任 祝 谦

编 委 陈重秋

张新泰

主 编 李维青

执行编委 李春华

执行编辑 罗 沛

英文翻译 崔延虎

装帧设计 王 洋

石永强

周菁葆 苗普生

沈福伟 张国刚

张 田(执行)



出版说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②。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丛书编委会在第二版中除了保留第一版已出版的8种选题之外,又在全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注重突出学术观点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已出版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9年6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s auf Gegrundeter Studien, 1877—1912年, 5 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

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 Przwev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的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由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

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考察,有了极其巨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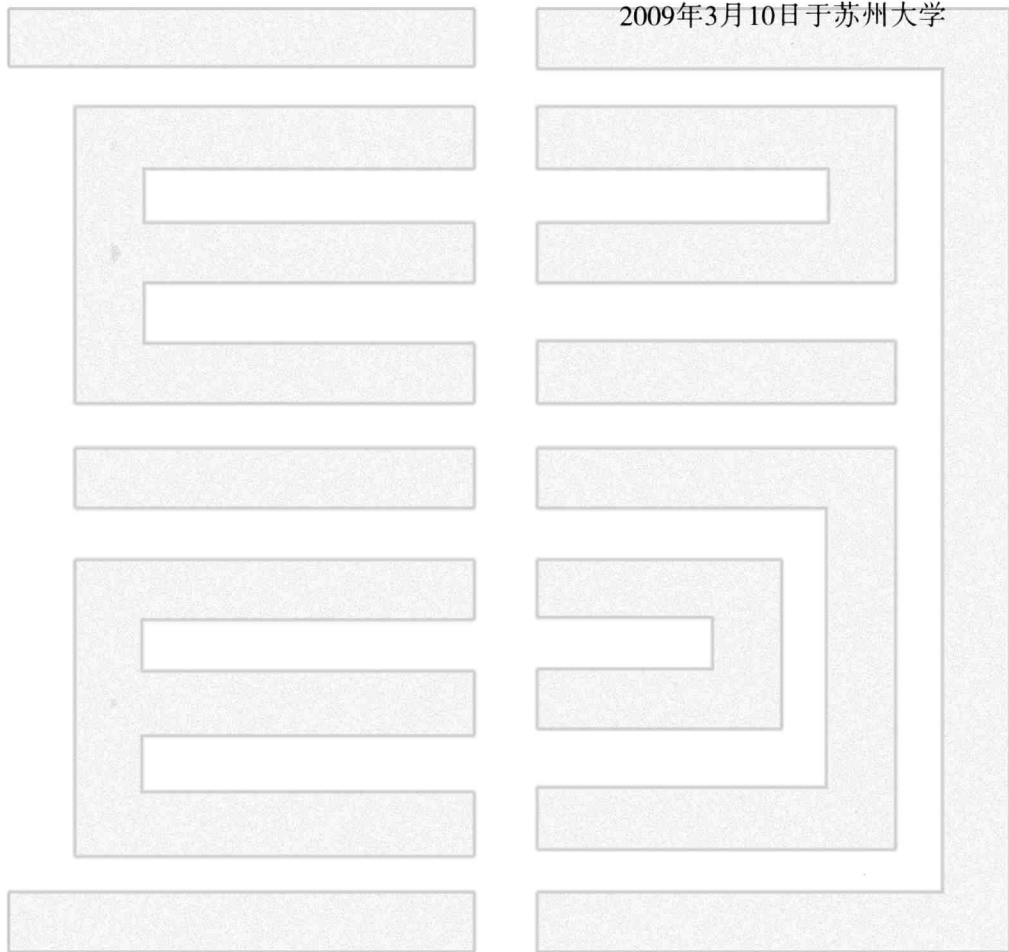
丝路学研究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是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

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09年3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总序二）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通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 16:10; 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華要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華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境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作“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作“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我看了丛书选题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在古代丝绸之路新疆路段上,曾经分布过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之国。《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从汉武时的三十六国到分裂为五十余国,显示了西域纷杂的族组合和族分裂。许多学者对此有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对丝绸之路诸国的族源史有相当多的考证。其中也往往伴随古代族史的讨论,对西域诸国人民的种族(人种)属性给予种种推测。其依据不外靠文献、语言乃至考古文化。例如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其《西域文明史概论》中,以为从新疆地下发现之古代语言文字具有印欧语系特点,推论西域古代居民为雅利安种或伊朗人种。又据王国维的《西胡考》,“前汉人谓葱岭以东之国为西胡,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南北朝人亦并谓葱岭东、西之国为西胡”,提出了大的地理分布的族或模糊的东、西人群之分布。又如安作璋在其《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中称:“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居民大约都属于氐羌系;在大沙漠以北,自疏勒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这儿的“氐羌”是文献上的古族名,“原始的蒙古种”是人种名,两者并用,容易造成学科称谓的混淆。在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里,把前人对西域诸国人种的研究归为三说,即吕思勉的塞种即闪米特族(Semites)说;王日蔚的伊兰种说;张星烺的印度日尔曼说。他自己主张西域人种两系说,即按《汉书·西域传》之注,判断乌孙为白种之诺的克(Nordic)系,与北欧之条顿人、西亚之波斯人、阿富汗人相近;塞种即闪米特系,与古巴比伦、古亚述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同类。因此他判定,至少两千年前,越葱岭而直至新疆境内是“白种人之天下”。在这个判断里,虽持西域白种说,但仍是

以族为种的一种说法。美国的 W.M.麦高文在《中亚古国史》里论及土耳其斯坦太古居民时,也大致如是,以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或更晚时,中亚的雅利安人的一部分向东迁徙至喀什噶尔(即中国新疆境内)。这儿的雅利安人实系语族,常被

用来作西方人种的代称。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更多。大致来说,上述民族史学者的研究虽以族论种,但都取西域白种说。

然而也还存在相反的说法。如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史》里以葱岭为界,主张“葱岭以东,以黄人为主。葱岭以西,以白人为主”。又说“其东,非无白人,其西,非无黄人”,也有黄、白人“混合者”。这儿的黄、白人大概系指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俗称。他对中国史之汉代西域诸国之种族的判断又有“塞种、氐羌、汉族三种”之说。显然这还是以族论种的说法,但大致持西域黄种说。黄文弼在他的《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里也提出与白种说大致相悖的议论:“虽吾人不能说西域无雅利安人掺杂其间,但在汉代西域人从其体质及分布区域,主要不是雅利安人,而为东方种族。”据黄氏之考证,在“西域这个地盘自古‘即有汉人、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并按地区,“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里吉斯原野,故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邻于印度,故杂印欧种;吐鲁番盆地则汉人较多”。但他在《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里,依生活及服饰之比较,又说楼兰之土著“与塞种人不无关系”,“楼兰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为羌戎即塞种人之裔胄也”。

应该说,从民族史料的研究论民族之人种就如知道一个人的姓名而推其籍贯,看似有关,但又非必然。这种推论方法的限制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史料记述的不完全,常常是有此无彼,不可能对古代族的方方面面有完整的认识。其次,历史上的族特别像丝绸之路新疆段上的族类不仅十分多样,而且更迭频繁。另一个最普通的常识是族和种的分类,一个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是生物人类学的,两者不是相同范畴的。何况史料记载人种特征寥寥无几,无法精确判断。因此以族量种的史料考证,对西域的种族(人种)不可能作出精确判断。又如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特别是对西域种族繁复杂错地区,以语言文字推定种族更应该谨慎。因此,很难根据史料或语言文字资料的考证,对西域的居民整理出比较科学的合乎现代人种分类的系统来。从这个意义上,民族史学的研究如果缺了族起源和形成的生物学(人种学)背景,使人有“见物不见人”之感。像丝绸之路这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古代通道,了解这个通道的开拓和通达者的人种生物学特点,无疑是丝绸之路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多少年来,多少人想说清楚又很难说明白的问题。因此,直接对丝绸之路新疆路段上古代居民遗骸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但一般来说,像对待现生族类那样进行人种形态学调查,由于这些古代族的居民已经不保存软组织而难以考察。一个补救的办法是对保存下来的古人骨骼

进行形态学的观察与研究。尤其是头骨部分,常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的与活体头、面部特征相关的形态学特点。对这些特点,用专门的测量、观察和统计分类方法,提供充分的数据进行生物统计学的比较,也就是用人类学的所谓“民族人类学”(Ethnic AnthroPology)方法,对具体的人群或属于一定地域和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遗骨(特别是头骨)进行再研究,即可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这些彼此有联系的地域群体在人类学和生物学上一般称之为“种群”(Populations)。人类学家研究古代和现代人类种群,区别这些种群所特有的体质特点的组合。这种组合特点称为“人类学类型”。如果这些组合特点现在或过去与一定地域相联系,那么这种组合特点便称为“种族(人种)类型”。英国的 A.斯坦因据西域古文字(康居、龟兹和于阗语)之印欧语结合死者形貌特征(如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头发弯曲如波状、须短黑及长头型等),断定新疆古代居民为西方阿尔宾人种(Homo Alpinus),与现代的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人相近。这是早期学者试图利用形态学特征的组合求证新疆人种属性的一个例子。但这仅是孤例干尸的观察鉴定,缺乏群(组)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 A.基思也报导过 A.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的四个地点采集的 5 具古代头骨。他认为这些头骨具有自然演化形成的介于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的过渡特征。德人 C.H.约尔特吉和 A.沃兰特则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调查时采集的四个地点 11 具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他们把这些头骨分成三个形态组,即第一组为长颅型,与诺的克(Nordic)人有许多相似,同时与 A.基思的楼兰型(Lou-lan-type)也有很大相似;第二组是具有中国人(汉人)特征占优势的中间类型;第三组具有阿尔宾(Alpinus)性质的短颅型,属伊朗人类型。俄国的 A.H.优素维福奇也报告过从罗布泊附近掘走的 4 具所谓古突厥头骨,认为它们属于蒙古人种系统,但未能判定是哪种蒙古人种类型。从这些并不多的骨骼形态学资料来看,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种形态很可能是多型的。

除了骨骼的鉴定,英国学者 T.A.乔伊斯还发表过 A.斯坦因在中亚探险时收集的新疆及其邻区的活体形态调查资料,共 25 组,每组调查人数 9~72 人不等。据他的分析,新疆及其邻接地区存在 5 个人类学类型,即阿尔宾、土耳其、印度—阿富汗、藏、蒙种族类型。这种多人种类型与新疆周围地区分布的种族环境大致符合:在新疆东面,直接和狭面的东亚蒙古人种占优势地区相连;其南是藏族占优势地区;向北同准噶尔相接的是北亚蒙古人种广布地区;向西和向南,与暗肤色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人种)和帕米尔—费尔干人种类型分布地区相交错。因此,从现有不多的一些现代人体质调查资料和古代人骨鉴定资料来看,西域的种族环境显然属于人种学上典型的接触地带,从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开辟和通达很可能与这种多人种的复杂交错环境密切相关。但究竟是怎样的种族(人种)环境导致丝绸之路的开通?这个问题如果只用民族史学研究的以族量种的讨论是很难得出可信的结果。而过去少数几个外国学者发表的体质人类学资